

# 学术创业的组织伦理：障碍与突破

罗泽意，刘璐珠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摘要]** 学术创业的实质是大学通过将专有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向外部组织换取自我实现和满足社会需要之资源的过程。学术创业行动是学术创业联盟中的行动。从组织发展伦理视角审视，当前学术创业的计划 and 行动存在工具主义、自由主义和发展中心主义三大深层次的伦理障碍，需要从组织发展性角度进行重构。

**[关键词]** 学术创业；组织发展伦理；障碍；突破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1)04-0021-09

所谓学术创业，是指大学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将自己的专有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以实现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和自身发展的实践行动。这一行动模式有别于传统的以论文与研究报告获得主管部门的鉴定与颁奖为终结的科研行动<sup>[1]</sup>，它关注研究成果的应用及应用所产生的经济社会价值，并希望从成果应用过程中获得学术资源回馈。虽然有人认为学术研究和学术创业并不相互妨碍，甚至会产生显著交互作用，但是，学术创业仍然引发了学科规范和价值的激烈辩论<sup>[2]</sup>。这些辩论暴露了学术创业计划和行动的深层障碍，为学术创业提供了必要的反思和批判。本研究从组织发展伦理视角将学术创业置于大学同科研机构、企业、政府联盟的整体学术创业场域之中，审视学术创业过程中深藏于道德规范层面的障碍，提出学术创业应该突破工具主义、自由主义和发展中心主义，试图从组织发展性视角构建大学的学术创业计划和行动，助推学术创业发展。

## 一、工具主义组织伦理对学术创业的影响

### (一) 工具主义与“恶的平庸”

工具主义将大学视为通过学术创业行为赚钱的工具，而不是将大学发展作为学术创业的目的，将会导致“恶的平庸”<sup>①</sup>泛滥和责任主体的

虚无现象。在现代性条件和组织机制下，这些“恶的平庸”会在组织生产和行动的长链条中得到传递和放大，且集体行动的恶将变得没有责任主体，变成恶的“百慕大”。譬如，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在纳粹德国“犹太人大屠杀”事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从组织的工具主义角度看，艾希曼只是屠杀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他只是简单地服从组织的安排，对组织负责。甚至，如果单从其对组织的服从看，堪称“劳模”，但正是艾希曼“尽忠职守”的“劳模行为”提高了纳粹德国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效率。艾希曼从“劳模”转化为“罪犯”的关键节点在于他所置身的现代性组织机构的设置、运作及对人和组织的工具性这一单向度要求上<sup>[3]</sup>。除了“恶的平庸”泛滥，组织的工具主义还会导致责任主体的虚无。在现代性组织机制中，如果组织仅是实现集体目标的工具，那么整个组织都是价值中立的，组织中的人则都可看成是艾希曼那样的机器零件。作为不需要自我反思和自我决断的机器零件，在机器造成了“恶”的后果之后，机器不需要担负道德责任，零件更加不需要担负道德责任。试想，某个杀人犯用一把刀杀了人，刀应该担负道德责任吗？担负道德责任的只能是用刀杀人的人。

**[收稿日期]** 2021-03-11；**[修回日期]** 2021-05-08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联评审委员会项目“地方政府统筹创新创业高等教育资源的机制研究”(XSP17YBZC164)

**[作者简介]** 罗泽意，湖南邵东人，博士，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管理与知识创新管理，联系邮箱：luozhy83@163.com；刘璐珠，湖南娄底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行政与管理

## (二) 工具主义组织观影响学术创业责任

学术创业场域中的学术创业行动是组织集体行动,但是,这些组织集体行动最终体现在个人的组织化行动当中。组织的结构安排和计划、分工、秩序、控制等使个人行动变为组织集体行动。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无论是恶还是善都将被传递和放大。如果不能超越工具主义,学术创业场域中的组织化的个人显然不是完全的“道德责任主体”。因为,他无法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的道德责任。人们固然可以对组织化的个人做出善恶评价并进行奖罚,但是,组织化行为中的个人真的就可以完全承担善恶之道德后果吗?可能,使个人道德自我缺失、使整个组织道德责任湮灭的“幕后操纵者”应该承担更多的道德责任。这个“幕后操纵者”是组织领导吗?显然不是。组织领导也只是组织机器中的一个零件,尽管可以说是主要零件。

“水变油”骗局<sup>[4]</sup>中,如果不是成功取得一些组织的信任,将个人行为融入那些被信任组织的行为当中,便不可能给人民群众造成数以亿计的钱财损失。王某固然需要承担道德和法律后果,但“水变油”带来的恶真的全是他一个人造成的吗?没有组织的传递和放大,在20世纪80年代那种信息不发达的年代根本不可能造成那么巨大的损失。再比如,20世纪末的“特异功能找矿事件”<sup>[5]</sup>。如果不是成立“人体科学研究所”并特招了某些所谓“异能人士”,将运用特异功能找矿变成组织行为,“异能人士”便不可能纵横14个省市区和数十家单位协作开展“特异功能找矿”,也不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些恶的后果不能全部由“异能人士”们所负担,他们也没有负担全部道德责任的能力,因为这些手段恶经过组织功能而被放大了。放大了手段恶的组织是实际的“幕后操纵者”,应当承担道德责任。

如果大学的学术创业不能超越工具主义,忽视将学术创业场域中的组织构建成为道德责任主体,包括创业型大学在内的创业组织和组织化的个人将失去自觉的价值反思和价值确立,最终导致创业过程中的一些“必要之手段恶”变成“必然之结果恶”。并且,这些“必然之结果恶”将

通过组织放大为净余额的恶,从而成为纯粹恶。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学术创业在道德上的合理性就不复存在,成为空谈。

总而言之,不能超越工具主义的学术创业伦理对规范学术创业场域中的“恶的平庸”以及湮灭组织道德责任的“幕后操纵者”是无能为力的,必须要找到一个超越组织价值中立的路径,将长期游离于道德归责和道德建设之外的组织涵摄到学术创业伦理的视野之中,实现道德哲学范式从个人范式到组织范式的辩证转换。

## 二、自由主义组织伦理对学术创业的影响

### (一) 自由主义与学术创业价值异见

自由主义早在18世纪后期便开始兴起,成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与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线索。甚至有学者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与政治思想史就是自由主义的成长史、扩张史,以及对自由主义进行不同向度批判与反动的历史”<sup>[6]</sup>。自由主义最大的特点是理性主义、世俗主义和个体主义。虽然新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对发展和资源的观点的具体表述方式有所不同,但它仍然是以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世俗主义和个体主义为内核。学术创业场域的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指明创业资源的稀缺性和非给定性,继而通过稀缺性和非给定性共同构筑“经济问题”的基本假定;另一方面以极力提高创业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捍卫个体的自由权利为中心,主张以价格等自由市场机制配置创业资源。

学术创业面对学术创业场域中复杂的组织发展关系,需要通过观念和制度等在整个创业场域构建符合价值精神的更加合理的组织发展计划。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将造成个体伦理和整体伦理的冲突以及一般理论与特殊理论的矛盾。作为发展伦理,学术创业伦理的批判以整体为基础,强调整体权力与整体发展;应该对学术创业场域中的组织发展进行好或是坏的评价,回答什么是好的“组织发展”。如果不能超越自由主义,学术创业场域的组织就不可能形成共容价值,场域内的资源交换就可能由于价值异见性而沦为抗解问题,使创业资源不能实现柔性集聚,使知识集体创价失败。最终,它将使学术创

业场域中各组织的自我实现和社会需求的满足受阻, 难以实现整体发展。

(二) 自由主义组织观影响学术创业的资源聚集

学术创业计划如果不超越自由主义, 会导致学术创业场域的资源聚集成为抗解问题。抗解问题由彻奇曼提出, 一般是指那些无法清晰界定、依靠专业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sup>[7]</sup>。其核心要义是: 由于问题界定和解决方法的不确定性、强复杂性和价值冲突性等属性, 无法由传统的理性-技术、工程范式、科层制和管理主义解决。简单来说, 抗解实际上就是各方利益达到了某个低层次的平衡。

对于学术创业场域的组织发展而言, 只有那些能够实现各组织共同发展并且能促进社会进步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 才是有价值的发展。毫无疑问, 任何的组织发展都需要消耗资源。学术创业场域的组织的好发展之基础是创业资源在场域内的柔性聚集。一方面, 学术创业资源涉及政府、高校和企业等多个相互影响的主体, 存在公共部门、事业单位和私人企业等多个系统, 产生于学术创业资源整合的进程和结构交错的复杂依赖关系中。另一方面, 政府、高校和企业学术创业资源整合问题的界定和解决方法上有不同的观点。这些差异化和冲突的战略可能导致创业决策讨论停滞不前或者出其不意的结果。

如果不能超越自由主义, 学术创业决策将从完全不同组织的个体主义和自由权利出发而作出, 造成政府、高校和企业处理创业问题的制度安排高度碎片化。如此, 政府、高校和企业等主体一定会缺乏学术创业资源的协同意识。进而, 整合创业资源从本质上就无法达成一致。更何况, 学术创业资源整合有形亦无形的特征会进一步加剧其复杂性。政府、高校、企业本身就存在价值、观念和利益上的差别, 学术创业资源整合亦需跨越不同领域、不同高校、不同部门等进行有形和无形的整合。如果学术创业场域中的各组织都按照自由主义的规范行事, 组织的“正确的决策”都必须通过经济价格体系来解决, 那么, 政府的参与学术创业中追求公共利益的目的以

及作为核心参与者的大学对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自我实现目的都将被异化。这样的学术创业场域、这样的组织发展显然不是一种好的发展, 不是学术创业伦理所倡导的发展。

(三) 自由主义组织观影响学术创业的集体行动

学术创业伦理如果不超越自由主义, 会导致学术创业场域的集体行动和整体权利被忽视。自由主义者认为, “每个人的生活应该由他自己选择, ……人能为重大影响他们自己生活的决定负责, 或者, 人有能力判断别人为他们的决定”<sup>[8]</sup>。当前, 西方主流发展伦理学本质上都是自由主义。譬如, 具有代表性的德尼·古莱和内格尔·杜威等人认为“注重民族、社区等具体群体利益的社群主义之类的整体主义发展观在本质上是一种错误的社会理论、贫困的社会学; 社群主义往往成为各类极权体制的理论基础”<sup>[9]</sup>。自由主义的发展伦理过于注重个体本位, 他们对平等、自由、尊严等一系列的伦理概念都是从个体出发进行理解的。自由主义忽略集体行动和整体权利决定了它无法应对学术创业场域的复杂风险, 无法保障场域内组织实现好的发展。

创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场域, 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学术创业场域风险尤其大。学术创业行动是一种包含知识发现到技术应用的知识生产全过程的多组织协同的知识创业行动, 其风险比单纯的知识创新和单纯的创业都要大得多和复杂得多, 呈现出深度的不确定性和非线性特征。首先, 知识创新本身就是一种对未知的探求, 这意味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未知探求的活动, 不管是探求方式还是探求过程都是开拓性的、尝试性的, 这些开拓和尝试的方式和过程本身充满着风险。其次, 学术创业领域是不同性质组织在知识创新全过程的联盟。这个创新联盟是由不同性质和不同目标的组织参与而形成的相对紧密的联合体。因此, 在学术创业场域中, 合作组织之间的管理模式、合作方式、运行机制以及利益分配和目标确定方面都可能产生相对排斥的分歧。此外, 各创业组织之间在联盟运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不可控的情况。相对排斥的分歧和不可

控情况往往会影响到学术创业联盟的稳定性和效率。特别是在联盟的内部,企业同时需要面临残酷的市场竞争,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同时面临人才的流失和技术发展的瓶颈,而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稀缺性,这些因素都会对联盟的发展产生威胁,成为学术创业场域的运行风险因素<sup>[10]</sup>。因此,知识创新本身的复杂性和学术创业场域中的多组织文化、组织间信任程度、组织间利益分配方式、复杂外部环境等会给学术创业场域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

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世俗主义和个体本位主义决定了它无法应对学术创业场域的复杂风险。按照世俗主义和个体本位主义的逻辑,个体的自由权利才是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学术创业场域中,利益“是一个理性的人无论如何都想要的东西。不管一个人的合理计划的细节是什么,都可以假定,有某些东西对他来说是越多越好的”<sup>[11]</sup>。如果学术创业场域中只有个体的自由权利而无集体权利,所有人仅根据自身的投入和收益来计算和应对风险,不同性质和不同目标的组织间的利益冲突将不断加剧。如此,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风险应对必然会低估学术创业场域风险的复杂程度,加剧学术创业场域复杂风险应对行动的碎片化。而事实上,作为一个知识创新的集体行动,任何一个环节和单元的风险应对不及时或者应对不当,对集体而言都可能是致命的。此次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乏力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更何况,没有集体权利统领下的个体权利理性化会偏向于一种“消极自由”。因此,从应对复杂创业风险角度看,学术创业的计划 and 行动必然要求超越自由主义,尊重个体权利的同时寻求同等的集体权利。只有将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视为同等重要的东西,才能应对复杂整体风险,达到组织个体发展和多合作组织共同发展。

### 三、发展中心主义组织伦理对学术创业的影响

#### (一) 发展中心主义与“南橘北枳”

所谓发展中心主义,就是希望通过发展得到一切,非理性地把解决所有问题的希望都托付给被片面理解的发展<sup>[6]</sup>。从发展伦理的研究进展可

以发现,西方发展伦理学的发展观大多具有发展中心主义的特点。比如,古莱、可思波等人就很少对发展本身进行必要的深入反思。在西方发展伦理研究者眼中,发展已经是人类选择的正确行动。他们认为,当前发展伦理主要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将西方相对成熟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问题,是如何将全球纳入西方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语境中的问题。殊不知,虽然构建一个好的发展、有伦理的发展是一个几乎能够为所有发展主体所接受的一般目标,但是,发展情境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的发展主体和人类社群对什么是好的发展、什么是有价值的发展以及什么是合乎伦理精神的发展都有着不同的理解,甚至,很多时候不同发展主体和人类社群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相互冲突的。因此,以西方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为核心的发展中心主义是必然要超越的。

创业型大学与学术创业等概念都发端于西方世界,西方国家学术创业发展的理念和模式是适合西方世界的理念和模式,照搬照抄是否能够在我国结果?是否符合我国学术创业场域中的发展主体之情境?这牵涉到学术创业伦理的本体论问题。如付八军等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认为,创业型大学的建设和学术创业应该构建本土化的中国模式,否则将会出现“南橘北枳”的结果。

#### (二) 发展中心主义组织观影响学术创业机会

发展中心主义会破坏学术创业的多样性,进而剥夺部分大学和企业参与学术创业场域的机会。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大学的资源禀赋不同,其参与学术创业场域的核心资源便不同,其所主导的学术创业场域中的组织结构、组织间合作方式等都会有所区别。从发展实践和文化心态的关系角度看,对学术创业场域中发展与组织的关系的多样理解,关于发展文化态度的多样性、多元化,始终是伴随发展进程的一个客观事实<sup>[6]</sup>。正是对发展理解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才为学术创业场域中的知识聚集提供了多种样态,才为创业型大学建设提供了多种模式。多样态和多模式是推

动学术创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和主体竞争机制。发展中心主义试图提供一个标准化、同一化的知识聚集样态和创业型大学建设模式, 固然在达成基本共识方面有可取之处, 但会取消诸多大学走向创业的基本权利, 也会湮灭许多企业参与学术创业场域的机会。譬如, 曾经有很多中外学者认为, 大学的创业仅是基于重大科研成果和科研能力的创业, 因而进一步认为只有研究型大学才具有建设创业型大学的资格。后来的学术创业实践证明, 在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诸多非研究型大学, 基于人才培养功能成功实现了向创业型大学的转型并且生机勃勃。即便是在研究型大学转向创业大学的过程中, 也多具异质性, 并非都是通过重大科研成果的技术转移达成的, 一些研究型大学是通过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社会发展提供优质的决策咨询而获得创业成功的。

### (三) 发展中心主义组织观影响创业关系认知

发展中心主义容易导致对发展与创业组织之间的关系认知狭隘化, 进而导致学术创业的本体性缺失和大学组织异化。发展中心主义注重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全球推广, 力图实现发展的普遍化。什么是最好推广的理念和模式? 当然是唯效率论和唯经济论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它们也是在中国学术创业实践过程中最常见的错误。一部分高校的高层管理者认为, “学术资本化是大学的新使命, 创业型大学的对象也从传统的学生变成高等教育服务、课程与研究产品的消费者。……只有把自己的产品推销出去, 才有可能在‘市场化’生存的新生态中生存与发展”<sup>[12]</sup>。在唯效率论和唯经济论的影响下, 大学的对象都变成了能够换成经济资源的东西。试问, 不以学生为对象的大学还是大学吗? 如此, 创业型大学不异化成企业才会是咄咄怪事。这种唯效率论和唯经济论的发展是狭隘的发展, 它忘却了在学术创业场域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在学术创业伦理中, 组织的自我实现永远是目的, 一旦抛弃了这个目的, 变成唯利是图的工具, 连目的善都不复存在的学术创业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况且, 对于

学术创业场域中的组织而言, 政府的目的绝对不仅仅是促进经济的发展, 还有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发展; 大学的目的也绝对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追求真理, 是为了自我实现, 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此外, 效率越高, 创业就越成功吗? 显然, 在主体性和目的善缺失的前提下, 效率越高离目的善愈远, 产生的恶就越多。

因此, 学术创业伦理必须要超越发展中心主义, 在学术创业场域达成基本的发展共识之基础上, 鼓励学术创业的多样态和多模式, 而不是一味地想着取消学术创业的文化异质性和构建标准化的文化心态。

### 四、学术创业伦理障碍的突破

“一个个体之内, 有两种或更多的不同逻辑以多重的方式(竞争和对抗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而不同逻辑的对抗性并不消失于整体性里。”<sup>[13]</sup> 学术创业是一个复杂的发展场域, 无论是学术创业伦理的目的善还是手段善都是对立的统一和统一的对立。学术创业场域中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多种价值观的交织需要一个对组织发展的目的、发展内容和发展手段进行评价的视角来对学术创业伦理进行认知。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多种价值观的交织必然带来多重逻辑的冲突和融合问题, 组织共同发展便是维持对抗性和整体性共存的重要基础。因此, 除了历史整体性角度外, 还需要从组织共同发展的角度来重构学术创业计划和行动。

#### (一) 学术创业伦理突破的理论向路

任何组织的发展以及任何价值都是具体的和有边界的。从组织发展性角度重构学术创业的计划和行动, 有助于在学术创业行动过程中减少创业场域中组织对自身主体性的不恰当扩张。学术创业场域中, 不同逻辑的对抗性之所以不会消失于整体, 原因便在于各组织追求价值过程中不脱离条件地去追求和推进以自我为中心的绝对价值。脱离条件去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绝对价值必然导致主体性丧失。中世纪, 教会推进以自我为中心的绝对的永恒的价值, 将大学视为“婢女”, 带来的只能是大学的激烈反抗, 最终失去其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主体性。从组织发展性视

角看,大学不是学术创业的工具,学术创业是为了大学能更好地自我实现和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学术创业场域的发展是为创业场域中所有组织提供合法利益并保护其合法利益。

现代复杂发展社会不断演进,学术创业的发展既是现代复杂发展社会演进的结果,也是现代复杂发展社会演进的表现。从组织发展性视角重构学术创业计划和行动,首先需要形成一个具有“逻辑自洽”和“现实行动”相统一的逻辑理解和解释。为了理解和解释现代复杂发展社会,帕森斯、哈贝马斯、吉登斯、奥尔森、贝克等众多学者都试图提出自己的理论。其中,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结构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以及奥尔森等人的“集体行动理论”都能够为理解和解释学术创业规范提供重要的基础性借鉴。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是人类社会当中的基本需要和存在方式,交往行为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sup>[14]</sup>。他主张用交往理性的“主体间性”哲学范式改造“主客体间关系”的传统哲学范式,以克服工具理性、应对社会发展中的伦理危机。按照交往行动理论,把人的行为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是“按照技术规则进行的,而技术规则又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交往行为”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人类奋斗的目标不是使“工具行为”合理化,而是使“交往行为”合理化<sup>[15]</sup>。

按照“交往行动理论”,在学术创业场域中,大学和政府、企业等组织之间都必须坚持一种“为他责任”才能维持场域的稳定。在“为他责任”的约束下,即便价值诉求和行动逻辑存在差异,政府和企业也不能视大学为纯粹工具,大学同样不能视政府和企业为纯粹工具。事实也是如此。加入学术创业场域的组织不是创业的工具,创业只是为了更好地通过集体知识创价来实现组织发展和自我实现。但是,需要清楚地看到,在学术创业场域中各类组织的价值诉求和价值评价标准会有所差异。譬如,从大学的立场看,虽然也看重能否通过资源交换获得下一步知识创新和知识生产的“原材料”,但它们更加重视

的是学术声誉等非物质的价值。在判断知识创新价值的标准上,大学更加看重的是对知识发现和学科发展的价值。从企业的立场看,不能孤立地看待技术创新或其他新组合,创新必须将市场的因素考虑在内。因此,谢德荪从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的角度对创新价值提出观点,“如果不能创造(经济)价值,新产品不过是发明,而非创新。……创新的意义不在于新科技、新产品或新服务,而在于创造新价值,因为没有(经济)价值的新科技或新产品不能带来利润,只是浪费资源”<sup>[16]</sup>。学术创业场域中的多组织集体知识创价行动特质决定了学术创业伦理必然是一种交往行动的伦理,各组织之间需要理解与共识的主体间性目标。场域中的每一个组织都是目的,而不应当被其他组织视作达成它们目的的手段。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也为学术创业伦理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借鉴。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为深化发展伦理研究构建了一个具有解释力和可操作性的理论框架。奥尔森认为,集体、集团、组织等是解释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集体行动有其自身的逻辑与规律,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个体逻辑;利益是集体行动的内在动因,但不同类型的集团有具体的行动个性和行动逻辑;处理好不同类型集团间的张力,约束特殊利益集团,构建具有共容利益的发展关系、发展制度是解决发展问题和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选择<sup>[17]</sup>。

## (二) 学术创业伦理突破的实践向路

根据“交往行动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从组织发展的伦理视角看,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对学术创业的计划 and 行动进行重建或是改进。

第一,体现组织是解释学术创业场域发展的基本单位。显而易见的是,学术创业不是教授们的单个行动,个人行动在学术创业场域中是无法维持稳定的创业行动流的。因此,伯顿·克拉克一直强调创业型大学具有“激活的学术中心地带”和“强有力的驾驭核心”。亨利·埃茨科威兹、希拉·斯劳特等国外研究创业型大学的专家也都是从组织行动和组织边界等角度分析和解释学术创业现象的,只有付八军等少量国内学者

从学术创业和教师转型的角度研究创业型大学和学术创业现象。即便如此, 这些国内学者也都是从组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譬如, 杨婷对美国大学学术创业保障模式的研究、韩萌对剑桥大学学术创业集群的研究等都是围绕大学组织角度进行集群的研究。至于企业和政府, 它们参与学术创业场域就更加不可能是个人的行动。由此看来, 学术创业伦理的构建和研究也应当倾向以组织为基本单位。以单个人的单个创业参与行动作为分析基本单位, 很难构建具有一般规范的学术创业伦理。

第二, 体现学术创业场域中组织行动的不同利益追求和行动逻辑。对于组织而言, 是否参与学术创业的集体行动, 必然是理性分析和选择的结果。组织的理性体现在学术创业场域中为获得集体利益的投入和该投入给组织带来的效益之间的比较。学术创业场域中不同的组织具有团体间的异质性, 获益度、参与成本和创业效益独占的可能性共同影响组织参与创业场域的行动选择。一般而言, 创业行动的偏好度同获益度成正比, 和参与成本及创业效益独占的可能性成反比。马永霞等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 29 个省域大学的学术创业绩效的分析结果<sup>[18]</sup>表明, 资金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网络资源及区域环境资源是影响各地高校学术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 从区域角度看高校整体创业绩效, 东部(0.103)高于中部(0.037), 中部高于西部(0.023)。显然,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政府参与力度、政策保障力度和企业参与主动性等原因, 东部高校创业行动的偏好度远高于中部和西部的高校。

第三, 将利益相容的规范作为学术创业计划和行动的重要考量。与传统的经济学认为个人的自利本性乃是社会的基础以及个人自利会最终导致集体利益不同, 集体行动理论认为自利不会导致集体利益, 从个人理性和自利的前提无法推演出人们会作出增进集体利益的行为。因此, 在学术创业场域中, 如果某个组织完全出于自利的目的, 那么它在学术创业的集体知识创价行动中会尽可能地减少投入, 以便将自己应付的成本转

嫁给其他组织。与此同时, 在公共创业效益的分配和消费时, 完全处于自利目的的组织会尽量多占有份额, 以便将自己的支出转嫁给其他组织, 如此, 学术创业的集体知识创价联盟必然崩溃。因而, 在学术创业场域中, 各创业组织的集体行动不是个体性、主观性的自由行动, 而是具有必然的整体性和客观强制性的行动<sup>[6]</sup>, 形成创业集体行动的重要条件是在学术创业场域形成利益相容的合理规则、制度和合作形式。

### 五、必要的讨论

虽然道德自身仅是一种行为规范, 但道德的实现是一种实践行为, 伦理则是优良的道德。因此, 大学创业伦理是一种应用伦理, 需要和大学创业的实践相结合进行构建。

本研究试图在批判工具主义、自由主义和发展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基于交往行为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重构大学学术创业的组织伦理。但是, 从大学创业实践发展的角度出发, 还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一个是工具主义、自由主义和发展中心主义的历史贡献问题, 另一个是以交往行动理论及集体行动理论作为基础构建大学学术创业伦理可能存在的不足问题。

第一, 工具主义、自由主义和发展中心主义在学术创业场域中虽有其历史贡献, 但存在突破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从历史效果看, 工具主义、自由主义和发展中心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形态转换、人类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和人类权利的推进发挥过巨大的作用<sup>[4]</sup>。当前, 很多学术创业的实践者在学术创业过程中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工具主义、自由主义和发展中心主义倾向。在工具主义、自由主义和发展中心主义的指导下, 一些大学在学术创业方面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 从长远发展看, 如果不实现组织伦理障碍的突破, 大学学术创业实践将无法从组织发展视角构建学术创业计划和行动的伦理指引。学术创业的批判者所担心的诸如资本逻辑侵蚀人文主义等现象可能真的会普遍出现。如果不能超越工具主义、自由主义、发展中心主义, 学术创业的伦理基础便无法得以良好构建, 学术创业的计划和行动将继续在道德

苦海沉浮不定。道德争论不休对于规范性组织的大学而言,隔岸观火、举棋不定就必然继续成为大部分大学的选择。这无疑会磨灭教师对学术创业的热情和积极性,延滞大学通过学术创业自我实现和满足社会需要的目的善之实现进程。

第二,交往行为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虽也存在一些缺陷,但能为学术创业的组织伦理提供一种构建的基础方向。

交往行为理论与集体行动理论和其他的理论一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缺陷。譬如,交往行动理论以共识真理作为基础,把真实性、公正性、真诚性视作交往行为的三大有效性要求,把话语共识、行为成功当作交往理性实现与否的标志<sup>[19]</sup>,带有比较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集体行动理论在提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时,并未对组织文化的作用进行过多关注,而事实上,组织文化对于塑造合乎伦理的组织行动以及克服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交往行为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为从组织发展性视角认识学术创业的计划和行动提供了一个总体具有“逻辑自洽”和“现实行动”相统一的理解和解释基础,指出了学术创业场域的复杂结构和复杂发展特征需要包含主体间性和利益相容计划以及行动认知。

#### 注释:

- ① 所谓“恶的平庸”是常人囿于习惯所产生的恶,是为权力或习惯所左右、缺乏自我反思及自我决断的人所导致的恶。它是在现代组织机制中才能实现的一种恶。具体参见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

#### 参考文献:

- [1] 温正胞. 刍议我国大学科技创新引领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应然功能与实然困境[J]. 教育观察, 2014, 3(7): 1-3.  
WEN Zhengbao. On the function and dilemma of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lead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J]. Survey of Education, 2014, 3(7): 1-3.

- [2] 苏洋. 世界一流大学如何平衡教师学术创业引发的冲突——斯坦福大学的经验与启示[J]. 比较教育研究, 2020, 42(4): 10-17.  
SU Yang. How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balance conflicts caused by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J].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20, 42(4): 10-17.
- [3] 王珏. 组织伦理与当代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J]. 哲学研究, 2007(4): 97-102.  
WANG Jue. Organizational eth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moral philosophy paradigm[J]. Philosophical Research, 2007(4): 97-102.
- [4] 张岩. 尊重科学的判决——记“水变油”名誉权案审理始末[J]. 科技文萃, 1994(6): 167-168.  
ZHANG Yan. Respect the judgment of Science: on the trial of the case of “water to oil” reputation right[J]. KE JI WEN CUI, 1994(6): 167-168.
- [5] 郑锦城, 林新多, 孙舸. 略谈“特异功能找矿”[J]. 地质科技情报, 1991, 10(2): 63-66.  
ZHENG Jincheng, LIN Xinduo, SUN Ke. Prospecting with “specific function of human body”[J].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1, 10(2): 63-66.
- [6] 陈忠. 发展伦理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CHEN Zhong.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ethics[M]. Beijing: 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3.
- [7] ROBERTS N. Wicked problems and network approaches to resolution[J].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00, 1(1): 1-19.
- [8] 约翰·S.麦克利兰. 西方政治思想史[M]. 彭淮栋,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3.  
MCCLELLAND J S.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M]. Trans. PENG Huaidong. Haikou: Hainan Press, 2003.
- [9] GASPER D. The ethics of development[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0] 朱清. 产学研知识创新联盟运行风险控制研究[D].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7.  
ZHU Qing. Research on operation risk control of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knowledge innovation alliance[D]. Harbin: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7.
- [11] 刘明. 自由主义人权观的人性基础及其局限——历史

- 主义的分析视角[J]. 文史哲, 2020(5): 156-164, 168.
- LIU Ming. The human nature basis and limitations of liberal human rights view: A perspective of historicism[J].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2020(5): 156-164, 168.
- [12] 陈笃彬. 地方高校建设创业型大学的理论与实践[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6.
- CHEN Dub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in local universities[M].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16.
- [13] 埃德加·莫兰. 反思欧洲[M]. 康征, 齐小曼,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 MORIN E. Penser l' Europe[M]. Trans. KANG Zhen, QI Xiaoman. Beijing: Life, Reading, Xinzhi Sanlian Bookstore, 2005.
- [14] 王继军, 马晓云.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及其现代政治价值导向[J]. 求索, 2013(7): 87-90.
- WANG Jijun, MA Xiaoyun. Habermas' communicative action theory and its modern political value orientation[J]. Seeker, 2013(7): 87-90.
- [15] 向德平. 科学的社会价值[M]. 杭州: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 WANG Depin. The social value of science[M]. Hangzhou: Zhe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98.
- [16] 周作宇. 协同创新: 集体知识创价行动[J]. 现代大学教育, 2013(5): 1-10, 112.
- ZHOU Zuoyu.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Value creation through knowledge synergy[J]. 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 2013(5): 1-10, 112.
- [17] 曼瑟·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陈郁, 郭宇峰, 李崇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OLSON 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M]. Trans. CHEN Yu, GUO Yufeng, LI Congxi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ress, 1995.
- [18] 马永霞, 窦亚飞. 驱动或抑制: 哪些因素影响了高校的学术创业绩效——基于29个省域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教育发展研究, 2020, 40(11): 8-17.
- MA Yongxia, DOU Yafei. Driving or inhibiting: What factors affect the academic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universitie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zzy set based on 29 Provinces[J].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20, 40(11): 8-17.
- [19] 王凤才.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述评[J]. 理论学刊, 2003(5): 38-41.
- WANG Fengcai. A review of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behavior[J]. Theory Journal, 2003(5): 38-41

## Obstacles and breakthrough of the organization ethics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LUO Zeyi, LIU Luzhu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is a process in which universities exchange resources for self realization and social needs from external organizations by transforming proprietary knowledge into productivity.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action is the action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alli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ethics, there are three deep-level ethical barriers in the planning and action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instrumentalism, liberalism and development centrism, which need to be re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ethics; obstacles; breakthrough

[编辑: 苏慧]